

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为千古名文，以一连串的“也”字句为其特色，对此有人喜欢有人讨厌。就我而言，其中最让我感到意味深长的，是在写了游人和太守主宾的游乐，以及黄昏时“太守归而宾客从也”后，又非常突兀地冒出了这样一句：

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

醉翁的言外之意是，当白天游人们（包括太守自己）在山林中游乐时，禽鸟自然是不会感到快乐的！

古往今来，文人多是自恋的。《醉翁亭记》一路写来，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，本来也难免此讥，却凭借这自嘲的一笔，中和了自恋的浓度，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。这就像欢场中的一句忠告，热闹中的一个冷眼，阿谀时的一声嘲笑，执迷时的一记棒喝……清醒的醉翁，竟能洞察人与自然的对立，有如此自我嘲讽的一笔！文章写到这分上，不愧为大手笔了。

近年来中外学界流行“生态批评”，意在超越人类自恋视野的局限，兼顾人类以外生物之存在，《醉翁亭记》此语亦堪为佳例。

想起了拦腰斩断了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，那一片对于人类而言的“死亡地带”，朝鲜半岛南北人民的伤心之地，现在却成了野生动植物和鸟类的天堂。此中情景，难道不也是一种“游人去而禽鸟乐也”？

不过，接着醉翁又倒退了一步：“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。”其实，“禽鸟知山林之乐”即已足矣，“不知人之乐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正如唐代张九龄的《感遇》诗所说的：

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谁知林栖者，闻风坐相悦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！

欧阳修写的是禽鸟，张九龄写的是草木，它们皆不依赖于人类，而为自足自乐的存在。但张九龄更强调“草木有本心”，讽刺了“闻风坐相悦”的“林栖者”；而从“何求美人折”的说法也可以看出，他实际上连带讽刺了楚辞以来的传统，即“香草美人”的传统，以香草配美人的传统。草木既然不希求“美人”的垂顾，自然更不会去关心“美人”之所思。从“生态批评”的角度来说，在尊重人类以外的生物方面，他比欧阳修更为彻底，走得更远。

顺便介绍一首与《醉翁亭记》有关的日本汉诗。日本近代文人森春涛（1818-1888）善作汉诗，其《岐阜竹枝》描写家乡岐阜的风景，被誉为“明治三绝”之一：

环郭皆山紫翠堆，夕阳人倚好楼台。香鱼欲上桃花落，三十六湾春水来。

此诗除第一句稍嫌生涩外，后三句纯为白描，颇为鲜活生动。而其第一句“环郭皆山”云云，显然是从《醉翁亭记》的首句化出的。

轻与重：昆德拉与宣太后

◆邵毅平

在西方文化传统中，有一派（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）认为，“轻”代表正，代表善，代表美丽……相反，“重”代表负，代表恶，代表残酷……但米兰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（L'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'être）中说：

但是，重便真的残酷，而轻便真的美丽？

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屈服于它，把我们压到地上。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，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。于是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。负担越重，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，它就越真切实在。

相反，当负担完全缺乏，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，就会飘起来，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，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，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。

那么，到底是选择什么？是重还是轻？（许钧译，上海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5页。“男人”原译作“男性”。）

他说的道理我们似乎能懂，但他用来说明“重”的好处的例子，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：“在历代的爱情诗中，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。”“于是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。”

类似这样内容的爱情诗歌，在西方文学史上应有不少，米兰·昆德拉似乎读过一些，否则不会说得这么明确；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读到过，大概是译者不好意思译过来？

那么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也有类似的表现吗？在《战国策》里，可以看到一例。公元前307年，楚国韩之雍氏，韩求救于秦，使节冠盖相望，络绎不绝，但都无功而返。只有一个使节尚靳，说话还算得体，秦宣太后（时秦昭王年少新立，宣太后治任当国）听了比较满意，表示可以考虑出兵，但又提出了先决条件：

妾事先王也，先王以其弊加妾之身，妾固不支也；尽置其身妾之上，而妾弗重也。何也？以其少有利焉。今佐韩，兵不众，粮不多，则不足以救韩。夫救韩之危，日费千金，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？（《韩策二·楚国雍氏五月》）

宣太后意在索贿，但先打了一个比方，却是奇葩之言：我与先王睡觉，先王睡相不好，把大腿压在我身上，我实在是不受得了；但与先王敦伦的时候，先王全身压在我身上，我却一点也不觉得重，这是因为他能让我快活……简言之，她的意思是，没有好处，轻也是负担；有了好处，重也不觉其累。

宣太后心中的这种轻与重的关系，与米兰·昆德拉的似乎不太一样，但我以为足以弥补后者的逻辑漏洞，也体现了中国式“中庸”思路的好处，反衬出西洋“非此即彼”思路的不足——并不是所有的“重”都是好的，也不是所有的“轻”都是坏的；反之亦然。判断的标准，就是是否于己有利。不过，他们用来说明“轻”与“重”的例子，却又符合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的原理。

那次秦国出兵抗楚援韩之事，最后是在甘茂手里解决的，所以《史记·甘茂列传》也提到了此事。但司马迁只说宣太后是楚女，所以反对秦国出兵助韩，而完全没有提到索贿一节：

（秦昭）王母宣太后，楚女也。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，乃以兵围韩雍氏，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。秦昭王新立，太后楚人，不肯救。

这么看来，韩使纷至沓来，皆因宣太后一点私心，偏袒娘家楚国，而均致无功而返。但据《战国策》，宣太后其实利欲熏心，为了索贿，娘家也是可以不顾的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二十五引《战国策》，有尚靳回韩国复命后，韩襄王“赂于太后”事，为今本《战国策》所无，则宣太后果然索贿成功。看来是先搞定了宣太后以后，才轮到甘茂来发挥作用的。

宣太后的这一索贿行径，让人想起了另一位母后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母亲，竟趁儿子事业发达，要敲儿子一笔竹杠，理由是自己当年怀孕时，曾吃了十个月的苦头：“于是，关于亚历山大的母亲的所作所为，就有许多流言蜚语，说亚历山大偶尔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他母亲说因为怀了他十个月，硬要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代价。”（[古希腊]阿里安《亚历山大远征记》，李活译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85年，第239页）一位问儿子讨怀孕辛苦费，一位为索贿不顾娘家安危，在爱财如命上，两位母后可真是异曲同工啊！

关于《史记》不载宣太后索贿事，今人范祥雍推测道：“《甘茂传》不载尚靳使秦事，史迁殆以其秽而删之欤？”（《战国策笺证》下册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542页）然而，焉知不是因为司马迁后来成了刑余之人，再也不能贡献“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”于女人，欲“秽”而不能，因触目惊心而刻意回避了宣太后的奇葩之言呢？这些大概都只有起司马迁于地下才能知道了。而司马迁之后，各种后起的史书，沿袭《史记》的做法，大都不载此事，或也“以其秽”欤？

论者一般以为，宣太后首开历史上两个先例：始称“太后”之号，始



▲ 昆德拉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

个通俗易懂的比方，对她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，就把天下古今的男人吓成这样！可贵的是《战国策》（及其前身）竟然留下了这样的记录，也难得整理之的刘向竟然没有把它们删除，此正如王士禛所言“皆大奇”也。

不过，过去除了道德判断之外，也有从虚构角度看待此事的：

当时喻喻如此类甚多，取其机相发而已。若此说则甚无耻，宣后即淫佚，语褻括其词以丑之。（明归有光语，范祥雍《战国策笺证》下册引，第1542页）

宣太后之行，国人知之，异国人皆知之，当时执管之士，因有此事，故作此言，用相嘲笑云耳。史家增饰之辞，美恶皆有之，后人或泥其一两言，以议当时之是非得失，其不为咸丘、高叟者几希矣。《国策》非实录之比，尤不足据。（清焦袁熹语，诸祖耿《战国策集注汇考（增补本）》下册引，南京，凤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414页。）

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，整个宣太后的话，都是执笔者杜撰的，是“史家增饰之辞”，亦即现今所谓“黄段子”，意在丑化、嘲笑宣太后，读者不可太过认真。但像宣太后这样的奇葩之言，非女人亲历者不能道，又绝不是男人所能代言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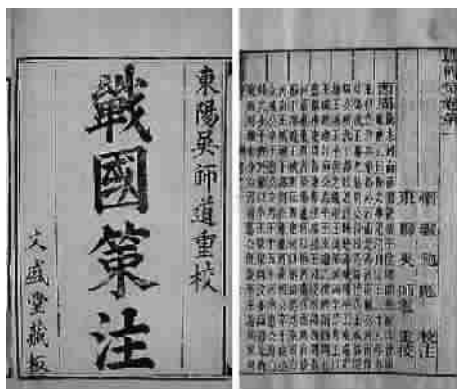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学者讲究知人论世，认为当时人说话本来如此，看法或许更合理一些：

这话更是赤裸裸的，简直是不顾羞耻的。这样的言语在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里是不可能写的。其所以见于《战国策》，也并非编者所能杜撰，而是这时的人君，包括太后，已经不似两周贵族那样温文尔雅，他们说话就是这样无所顾忌的。因此，书中记述这些言论的时候，也就别开生面，前所未有。（郭预衡《中国散文史》上册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10页）

这也成了《战国策》的特色之一。其实，如果更多一点这种“赤裸裸的”、“不顾羞耻的”大实话，那么中国的史书无疑会有趣得多。

此外，难得也有人轻松看待此事：

当时游士皆妾妇之道，而宣后又滑稽之雄。（清程夔初《战国策集注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



▲《战国策》

以母后临政。但历来的文人雅士（主要是男性吧），大概更受不了宣太后的任性，尤其是她的上述奇葩之言：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！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，则此言不以为耻，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。（元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》）

此等淫褻语，出于妇人之口，入于使者之耳，载于国史之笔，皆大奇。（清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卷二十一“秦宣太后晏子语”条）

让吴师道感叹“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”的，大概是后来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……秦国乃至当时的后妃，其强悍绝不亚于男人，以房事打